



见到或想到《学习时报》，我总有一种亲切感。

亲切感何来？细想起来，大概缘于这二重关系：一是我的岗位与她的关系，二是我个人与她的关系。前者，于她我是读者；后者，于她我是作者。

2009年4月，我从海南调入原国家行政学院工作，从事干部培训的管理与教学工作。《学习时报》作为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理论性报纸，自然就被我视为自己的报纸。原因有两点：第一，刊登干部教育培训的报道、体会和研究文章，是她的重要内容，因此，她属于我的专业报纸；第二，她以“学习”命名，毫无疑问，对我这个离不开学习的人来说，她属于办给我看的报纸。

这样，我就成了她的忠实读者。每当我跨进办公室，总要翻阅报纸，这当中就有《学习时报》。《学习时报》的最大特点是对党中央的脉搏切得准、对党中央的部署跟得紧，特别是这几年。例如，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解读，对“四个全面”“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宣传和阐释，对党的历次学习教育（活动）的报道和指导，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项改革的研究和见解等等，总是那么及时和到位。我相信，全国的读者们都会从中获益良多。

作为她的作者，现在查到的，始于2011年11月7日，这天的文化教育版发表了 my 文章《以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强国》，从此她就成了京城刊登我文章最多的报纸。对此，我心存感激。



□周文彰

我在《学习时报》所发表的文章，有两种类型，一是我希望她发的，二是她希望我写的。而且无论是我还是她，从来都没有失望过。这是我之所以见到她或想到她都有一种亲切感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我希望她发表的文章中，首推《让学习成为习惯》，刊于2013年3月25日，因为谈学习的文章在《学习时报》发表是最合适不过的。文章发表后我把她开发成一个专题讲座，至今一直在讲，前年又扩展为一本同名小册子，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发现在我们周围，有些同志不爱学习；有的很想学习，但总是抱怨没有时间，共同表现是没有让学习成为习惯。我的建议是，先从求进步、担责任、讲政治的高度强迫自己学习，学习要坚持，坚持成习惯，习惯成自然。学习习惯需要时间作保证；时间不是“挤”出来的，而是“安排”出来的。谁把业余时间安排得好，谁就会有学习时间和学习成就，因此“人的差异在业余”。人生成功的前提是：

善用时间，做时间的吝啬鬼；刻苦读书，做书本的痴迷者；勤于思考，做思想的永动机；钟情现实，做现实的有心人！因此，学习要应用于思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是我希望她发表的又一篇文章。因为在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发展很快，新内容、新理念、新方法、新形式在一些院校不断出现，但对干部教育培训的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于是，原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了公务员培训中心，招收公务员培训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我担当导师。渐渐地，我形成了关于这个方向的学科构想，并向《学习时报》记者介绍了这些构想。很快，记者写成一篇题为《把公务员培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访谈，于2015年8月31日见报，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作为学科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我主持编写的《公务员培训研究》《公务员培训

教学研究》两本书已经出版发行，我主编的“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博士文库”已经出书两本。现在，建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已经明确写入中央印发的《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对我们进一步推动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学科建设以很大鼓舞。

以上说的是我希望她发表的。此外，一些文章是她希望我写的。每遇她约稿，我总是马上提笔，按时完成，从没有因为忙推辞过、拖延过。我把约稿看成是她对我的信任，是给我的机会。这也许是有关版面的编辑对我也怀有亲切感的原因，编者和作者就这样以她为平台、也为着办好她而结为一体了。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编辑来信问问能不能为她担任责编的“我与改革开放40年”纪念栏目写一篇文章。这可是我有内容可写的话题。我是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1989年又调到刚刚成为经济特区的海南岛，一干就是20年，仅就海南的改革开放我就发表了200篇左右的

大小文章，出版过《特区导论》《经济特区二次创业》等专著，其间还被借调到原国家体改委工作两年。分两期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的《我们思想上还需要哪些超越》一文，1998年被经济科学出版社收入了《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由于这些经历，我很快完成了约稿的写作，以《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为题，发表于2018年9月28日的《学习时报》。微信推出后赞扬声不少，我看到责编在朋友圈儿还自豪了一把。这让我又一次感到，编辑看她组织和编辑的得意之作，就像母亲看孩子一般。文章发表后，清华大学校博士生讲师团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北京大学校团委等，邀请我去作了几场讲座，足见《学习时报》的影响。

《学习时报》刊登我的又一篇较长的文

章，4200字，是写我的博士生导师萧前教授的。萧前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创立者和奠基者之一，1985年9月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萧老师的学生。“学术人生”栏目的编辑约我写写萧老师。我喜不自胜，我太想写回忆萧老师文章了。没有萧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人生经历。当时我因动了个小手术在住院，正好有一个整块时间，使文章一气呵成。我满怀深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8个字藏头，为老师写了一首七律：马列终身信不移，克当使命乐从师。思维注满创新意，主体高扬实践旗。义理严明传智慧，哲言辩证解难题。学依病榻温经典，家国情怀弟子规。文章发表于2017年2月24日的《学习时报》，编辑用了一个非常典雅的标题：《窗间一经书生辈 亦开风气亦为师——忆萧前老师》。我跑到老师家，和师母一起，把这份报纸恭恭敬敬地放在老师遗像前，并深深地鞠了一躬。

《学习时报》创刊20年了，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我对她都心怀感激之情，感激她为读者提供了一份优秀读物，感谢她为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园地。衷心祝愿她更加好看！



□蔡为民

父母一生养育了四个孩子，我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作为家中老小，从小到大，我一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姐姐哥哥们的疼爱 and 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年来才开始慢慢领悟到：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实在太多太多，而能给予或为他们做的又实在太少太少，这着实让我在心存感激的同时，更滋生出一丝无言的愧疚。

大姐长我16岁，是名副其实的“大姐大”。常听父母说，大姐早年吃过不少苦，缺衣少食不说，更因为家里劳力缺乏，十五六岁就不得不“代母出征”，和大人一起辛辛苦苦劳作在大修水利的第一线。她生性聪明，小学时所写的作文就曾被省电台采用播出。遗憾的是，因为社会环境和家境所限，未能继续接受教育，但她从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始终坚守着对知识的渴求，19岁时硬是凭着初中肄业的底子以第一名的摸底考试成绩进入卫校学习，继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在同届同学中第一批成长为护士长。30多年的护理生涯，她始终精研技术，待患者如亲人，多次被评为县、地优秀团干、先进工作者。在我心目中，她好像一直扮演一种近似母亲的角色。小时候我体质较弱，每逢发烧总会全身抽搐，很是吓人。因为母亲忙于农活和照顾老人，常常抽不开身，几乎每次都会把我交给大姐，由她带到集体宿舍用心照料。烧退清醒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常常就是大姐，她总是静坐在病床前，焦灼的目光始终落定在我烧得通红的小脸上，一看到我醒来，她那紧锁的愁眉便瞬间舒展开来，有时还会高兴地叫出声来。尽管当时也就四五岁，但此情景仍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今天，退休后的大姐来京照看孙子，每逢周末或节日，也总还是时不时打来电话，邀我去她那里，然后忙上半天，准备满满一桌饭菜，开心地看着我风卷残云般大吃一顿。我也会遵照母亲的叮嘱，时不时去看看她，陪她说说话，以此聊解她独自在京的寂寞与乡愁。

二姐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父亲忙于教书，母亲忙于农活，加上家里有多位老人需要照顾，打小她就处于一种放养状态，常常是母亲上工时将她带

到田间，放在地头，任由她自己玩耍，下工时再随母回家。七八岁时，她便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常常是手里牵着哥哥，背上背着我，不时还要帮父母干些家务。因为弟弟们的拖累，到了适学年龄她未能走进校园，完全靠当教师的父亲教点东西完成启蒙，直到小哥俩稍大一点，她才得以插班上了三年级。二姐在四个孩子中可能是最不聪明的，但她的勤奋在周围却是出了名的。初中毕业时，为减轻家里负担，父母一心希望她考个中专或中技，早点吃上商品粮，却终因竞争太过激烈而未能如愿，不得已上了高中。那时的高中学制两年，别人都是高一就确定了文理科，而她高二才由理转文，时间之紧、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她硬是凭着那股不服输的韧劲、拼劲，实现了命运的完美逆转，成为全村史上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后先分到机关，后来毅然下海，后再来白手创业，还是凭着这份勤奋，顺利拿到注册会计师证书，成为一名优秀的财务专家。或许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教育经历，我俩交流较多，她不仅以自己的言行教给我天道酬勤、勤能补拙的道理，更是在求学、择业、成家各阶段，学习、恋爱、事业各方面都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她家庭观念极强，经济条件稍好一些，每每得知或想到姐姐、弟弟可能会有困难，总是主动、慷慨地伸出援手，买房，装修，买车，女儿转园、留学，每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我总会收到来自她的数目不菲的资助，既让我感动不已，也让我羞愧难当。她对我们如此大方，自己却是节俭得近乎苛刻。一次她来京办事，我去看她，没想到她住的竟只是那种经济型酒店极简陋的小间，以前只知道她给我们的资助，都是她辛辛苦苦一分分挣来的，那时才明白那更是她一分分省出来的呀！离开时，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只是任由泪水模糊了双眼。近些年，在我们和孩子们反复劝说下，二姐也开始时不时出去四处走走，每每看到朋友圈儿里她发的各地风光，看到她轻松灿烂的笑容，我的心中总会得到一丝慰藉，真心为她现在的状态高兴！

哥哥长我3岁。虽然年龄差距不大，性格却相差不小，他偏于外向，

我则相对内向。四个孩子中，他是父母和我们公认最聪明的一个，脑子转得快，动手能力强，可偏偏生性贪玩，小时候可没少让父母操心，也少挨父亲的打，加上未能如父愿考上大学，更让父亲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慨”，一直对他“另眼相看”。高中毕业后通过招干考试，哥哥成为一名法官。他边学边干，靠自学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并成长为一名优秀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荣获县、市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县政法系统十佳政法干警，市、省法院系统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并被省法院记过个人三等功，还被推荐担任了县政协常委。尽管领导、同事常向父亲夸起他的工作表现，可持有“偏见”的父亲总也不相信他那“不成器”的大儿子会有如此成就，直到有一天，家里大扫除，父亲无意中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大摞哥哥的获奖证书，才相信大家的果果然不虚。让父亲彻底改变看法的还是前两年自己重病在床时哥哥的表现。那年暑期，年逾八旬的父亲先是不慎摔断股骨头做了更换手术，没等完全康复，年底又出现脑部出血，前后卧床半年之久。此间大姐在京照顾孙子脱不了身，二姐和我也只能利用假期回家照料几天，全部重担都落在了哥哥一人身上。事后听母亲讲，那期间他推掉了全部的出差，每晚都会赶来陪床，中午还常要抽空回家看看，端屎端尿，洗身擦背，辛苦不说，偶尔还得忍受父亲因久病卧床而生的无名之火。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哥哥硬是默默独自承担起本应由我们一起承担的重任，直到今天也从未跟我们姐弟三人提起过一句。可喜的是，经历了这场“考验”，父亲终于彻底抛弃了以往的偏见，开始时不时乐滋滋地向周围人夸起这个儿子。

尽管我们四性格脾气有别，成长道路各异，选择职业不同，但幸运的是，我们共同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奋斗的精神，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善良的品质，无论何时，无论在哪儿，都能与人为善、真诚待人，踏实本分、用心做事，也都尽力取得了一点成绩，赢得了一个好的口碑。我们之间更是始终相互关爱有加，一路鼓励扶持，从没有因为父母的“偏心偏爱”生过

一点闷气，更没有因为承担赡养责任的多少计较过一句。姐妹连枝同气，花开并蒂；兄弟埙篪相合，其乐融融。我想，这份和谐、和睦、和美，不正是老父老母所喜闻乐见并聊以自慰、引以为豪的吗？

更让父母和我们欣慰的是，我们之间的这份亲情已经超越了时空，完整传承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五个孩子，年龄差距达到21岁，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亲如同胞的深情。女儿出国留学，外甥夫妇精心为她订了身小旗袍，外甥女则寄来了整套化妆品并附上手写的使用说明；每次女儿回国，时间再紧，也不忘抽空“宰”上哥哥一顿；女儿小时随我回家探亲，小侄子总会像个跟班不离左右，姐长姐短叫个不停，女儿留学后两人甚至几年不见，但每次我回去，他总要问我“大姐在美国还好吧”，而女儿每次回国，也总会问起，“我功成哥哥找女朋友了吗？弟弟学习咋样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每每看到这些，心中总是涌起阵阵暖意。

儿时因为家境贫寒，鲜有照片留下，姐姐出嫁后，加上二姐南下闯荡，我北上读书、工作，我们聚少散多，记忆中的第一张合影还是我上大学时在大姐家拍的。去年春节，我们相约一起回家陪父母过年，经我提议，年近不惑的外甥用手机为我们记录了这次难得的欢聚：母亲端坐中间，姊妹四人仍按照30年前的各自位置围坐两边。当晚，面对两张合影，我感触良多，遂将照片发到朋友圈儿，并即兴写下这样的文字“一娘所生，一奶所养，同胞亲情，血浓于水。感谢姐姐、哥哥的关爱之情，感谢上天让我们成为姐弟，成为兄弟。这辈子做不够，下辈子还想做你们的弟弟！”。我以为，这依然可以代表此刻我的心情，相信也同样是姐姐、哥哥的心愿！



繁文，指的是公文冗长。中国历朝历代虽出台不少政策举措禁止，但繁文犹如打不死的“小强”，延至今日仍是难治顽疾。

说起繁文根源，可溯及东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凡为文必须“骈四俪六”，内容大多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形式上讲究对仗工整和声律协韵，不惜因文害意，其时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汉武帝即位初年，东方朔上书自荐，足足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能扛得起，汉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东方朔担任太中大夫后，也有上书一篇文辞竟达十万字，而汉武帝当作巨著大加赞美。由于汉武帝的提倡，治国理政的公文成了大臣们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阵地，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等作品，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话来表述很多次，引用大量生僻词汇，华词堆砌，却思想匮乏。

繁文之风就此蔓延下来，即使是唐宋时期，繁文也大行其道，这从一些政策和批评可以管窥。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也发布过改革文风的《诫吏疏不实诏》，严厉批评公文中“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繁文现象。而宋朝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以致北宋理学家孙复也抨击六朝骈文影响文风“无一言及于教化”，只是“无用聱言、徒污简册”之物。

到了明代，繁文的“文牍”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其突出表现是行文多、长、空。知名的案例是，明朝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曾上《陈时务书》给朱元璋，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七千多字。朱元璋叫中书郎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五百七十字时，尚不知所云何事。朱元璋一时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杖打一百大板。翌日又叫人继续阅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方接触正题。最后的五百字，共讲了五件事。朱元璋感慨之下遂规定：今后凡有“繁文违式者罪之”。之后近十次颁布条例法令，规范公文写作，“减其繁文，著为定式”。

然而好景不长，朱元璋死后，繁文之弊再度泛滥，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明朝后期，官员往往乐于通过广列条目的方式陈述观点或表达诉求，这从此类奏疏的名称上便可知晓。如万历年间邱橐的《陈史治积弊八事疏》，侯先春疏的《安边二十四议疏》，天启年间杨涟的《劾忠贤二十四罪疏》等等。又如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李化龙所上《平播全书叙功疏》，历陈将士之战功，竟达六万余字！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整篇皆为华丽辞



□王厚明

藻，多抄袭古代圣贤的“仁政”观点，不仅没有一点新意，而且列举的例子也不接地气。崇祯皇帝看了刘宗周的奏折，大怒道：“尔等不干实事，只作文词弄朕！”随后下令阁臣拟严旨治罪。

尽管明代公文繁文之风一禁再禁，终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采纳一位辅臣的建议，让大臣把章奏中的主要内容，用不到一百字的话概括提要，贴在章奏后面，以便皇帝阅处，这就是明朝的公文贴黄制度。

历史跨越千年，繁文之风依旧。在1942年延安整风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的党八股文风，可谓对党内繁文的一针见血。

时至今日，文山会海、空泛繁文仍是困扰机关基层一大弊害。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发扬“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风是党风政风的反映，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繁文之风掩映官僚主义，污染政治生态，除却繁文之害，永远在路上！

